

近百年的中國漢語語文辭書

楊文全 著

漢語史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漢語史研究叢書

近百年的中國漢語語文辭書

楊文奎 著



巴蜀書社

2000 · 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近百年的中國漢語語文辭書/楊文全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0.3
ISBN 7-80659-062-5

I. 近… II. 楊… III. 漢語-辭書-研究
IV. H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18157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文小牛

近百年的中國漢語語文辭書

楊文全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神仙樹南郊村工業小區(028)518382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4.75

字數 355 千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ISBN 7-80659-062-5/H·5

定價:32.5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漢語史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張永言 趙振鐸 向 熹

主 編：項 楚

編 委：董志翹 宋永培 經本植

張一舟 伍宗文 楊宗義

汪啓明 陳大利 李 蓓

常務編委：董志翹 伍宗文

秘 書：雷漢卿

序

語文辭書是學習語言文字的重要工具書，它在國民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很重視語文辭書的編纂。我國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之一，辭書的編纂具有悠久的傳統。很久以前就開始了辭書的編纂。近百年來由于西方科學技術的輸入，辭書的編纂也受到了影響，出現了大批辭書，在文化的發展上起過不可低估的作用。總結它們的編纂經驗，對於發展我國的辭書事業將會有重要的意義。

自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我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了不少的變化。辭書的編纂一方面植根于古代辭書編纂優良傳統的深厚沃土之中，一方面又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指導，並在辭書編纂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辭書編纂逐漸走向成熟。其中語文辭書編纂所取得的成就是更令人矚目。

1915年在我國語文辭書編纂上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國出版了兩部重要的有影響的辭書。一部是陸費逵、歐陽溥存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字典》，另一部是陸爾逵、傅運森等人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

《中華大字典》採用了分別字頭的辦法，改變了《康熙字典》“一字之下，羅列諸切”的傳統；它還首創數字標示義項，使字典的條理更加清楚。書中一些新術語，諸如各種化學元素名稱、社會科學用語等，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辭源》最大的特點是單字之下帶出複詞，即全書以單字爲字頭，字頭之下列出以該單字起頭的複詞。複詞的排列方式是字數少的在前，字數多的在後，字數相同的又以筆畫多少爲序，這種編排方式成爲以後漢語詞典編排的基本方式。

這兩部辭書開創了現代語文辭書編纂的新紀元，作用不可低估。

“五四運動”發生于 1919 年，此後我國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爲了適應提倡白話文的需要，出版了各種普及性的白話文辭書外，一些學者開始學習國外辭書編纂的經驗，着手籌備大型辭書的編纂。1928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大辭典》編纂處，1936 年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山大辭典》編纂處，開始了這兩部大型辭書的編纂工作。由于時局不穩以及其它諸多的原因，這兩部辭書的編纂處雖然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最終却没有能够編寫出預期的詞典。學習他們的經驗，對於以後的辭書編寫還是有作用的。

十年內戰、八年抗日和三年的解放戰爭，我國處于一種動蕩的局面。一些學者在困難的環境中堅持工作，也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辭書。楊樹達的《詞詮》、裴學海的《古書虛字集釋》、朱起鳳的《辭通》、符定一的《聯綿字典》都稱得上是傳世之作，而中華書局 1936 年出版的綜合性大詞典《辭海》，對於後來的辭書編纂也很有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國的辭書編纂事業有了一個好的環境。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華字典》，這是一部很有影響的字典，到最近已經印刷了幾億冊。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56年接受了國務院編寫《現代漢語詞典》的任務，很快就編出了油印稿發送全國徵求意見，但是由于大家熟知的原因，這部詞典到1979年才和讀者見面。

“文化大革命”給我國文化事業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十年之間，辭書的編纂沒有什麼可以談的。倒是1975年在廣州舉行的中外語文字詞典編輯出版座談會給我國的辭書編纂帶來了新的活力。這次座談會規定了十年的辭書編纂規劃。如《辭源》、《辭海》、《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大型辭書《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的編纂，還有大批辭書的編寫計劃，它們後來都一一完成了。

二十年來，我國的辭書園地真是豐富多彩，品種之多、門類之齊全是從前幾十年所無法相比的。據不完全統計，出版的辭書有好幾千種。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辭書大國。

楊君文全受業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史錫堯教授之門，1995年來從我攻讀在職博士學位。考慮到他的實際情況，給他選了一個研究近百年漢語語文辭書的題目，目的是要他多讀一點書，四年的時間里，他勤奮努力地完成了規定的學習任務。寫出了合格的論文，受到了同行專家的好評，順利地通過了論文答辯。

整個論文共三十餘萬字。評述了近百年我國語文辭書的成就、經驗和不足，既有歷史階段的劃分勾勒，又有各種門類的分析闡述，全書採用點面結合的敘述方法，一個時期以幾部辭書為重點，清理了近百年我國漢語語文辭書的發展、體制沿革的綫

索，時有新意，如對過去評價不高的《中華大字典》給予了恰如其分、實事求是的評價。對前人少有論述的兩部未完成的大型辭書《中國大辭典》、《中山大辭典》作了認真、詳實的分析，評估了它們在近代辭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對近年新編的一些大型辭書，《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也作了評價。這是這本書的長處。

一篇成功的論文，要它更完善，沒有幾年的琢磨是辦不到的。楊君本來打算對論文再作一番修訂，精益求精。現正遇上一個出版的機會，故決定盡快把它整理出來交付出版，這是好事。求我作序，於是寫了這些感想，聊以塞責。

趙振鐸

1999年12月30日于

川大桃林村

前 言

辭書是將所選錄的字、詞、語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列起來，並加以解釋，以供人查檢的工具書。一般包括語文性辭書和百科性辭書。辭書是高密度、大容量的知識載體和信息寶庫，是人們朝夕相處、不可或缺的精神“顧問”。辭書的編纂對一個國家的教育與文化事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編纂辭書的國家，在千百年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適合于漢語辭書編寫的方式和方法^①。它是在長期的編寫實踐中形成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經驗模式，是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遠自周秦時代，我國辭書的編纂既已萌芽。相傳出於周宣王太史史籀之手的《史籀篇》（凡十五篇）、秦丞相李斯的《蒼頡篇》（七章）、車府令趙高的《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學篇》（七章）^②等，均為（三言）四言韻語的童蒙識字課本

^① 參見趙振鐸《論我國字典編寫的傳統》，載《詞典研究叢刊》（10），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

^② 漢初人們將李斯、趙高、胡毋敬所撰三書合稱《三蒼》，亦統稱《蒼頡篇》；魏晉時期，人們又以《蒼頡篇》為上卷，西漢揚雄的《訓纂篇》為中卷，賈飭的《滂喜篇》為下卷，亦合稱《三蒼》。

或通俗讀物，雖然還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字典，但却可以看作我國最早的一種漢字字彙集，對後世辭書的編寫無疑有一定的影響。而真正嚴格意義上的辭書則發軔于漢朝。如西漢初年的類義詞典《爾雅》^①，揚雄《方言》（中國古代第一部方言詞典），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國古代第一部字典）和劉熙的《釋名》（中國古代第一部詞源詞典）等開啓了中國漢語辭書的先河，為後代字、詞典的編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後魏張揖《廣雅》、南朝梁顧野王《玉篇》、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宋陳彭年等《廣韻》、丁度等《集韻》、司馬光等《類篇》、金代韓孝彥、韓道昭父子編的《改并五音類聚四聲篇海》、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明梅膺祚《字彙》和張自烈《正字通》、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佩文韻府》、阮元《經籍纂詁》等為代表的辭書在不同的時代各領風騷，20世紀先後編纂出版的《中華大字典》、《辭源》、《辭海》、《國語辭典》、《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等著名辭書，更是群星璀璨，光彩奪目。

中國古代辭書源遠流長，種類繁多。概括起來大致可分為三類^②：以《說文解字》為代表的講文字形義的字典，以《爾雅》為代表的講訓詁的詞典，以《廣韻》為代表的講音韻兼及文字訓詁的韻書。但最初的辭書並沒有“辭書”之名。辭書名稱的嬗變轉移，從另一側面反映了漢語辭書發展的歷史。現在所說的字典，中國古代習稱“字書”，本指解說文字形音義的著作。這一

① 一說《爾雅》成書于戰國末年，它的編者都是齊魯儒生。詳見何九盈著《中國古代語言學史》PP.17-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參見劉葉秋著《中國古代的字典》P.3，中華書局，1963年4月；又見其著《中國字典史略》P.2，中華書局，1983年6月。

名稱，最早見于《魏書·江式傳》，傳中有“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之句；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也言及字書：“西晉以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可見“字書”作爲解釋文字的著作的泛稱，在南北朝時期已經通用；《隋書·經籍志》著錄有佚名的《字書》三卷、十卷兩種（今俱失傳），則是以“字書”爲書名專稱的著作。《說文解字》雖不以“字書”冠名，而實際却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字書。該書集古文經學之大成，以“六書”理論作爲其解說字形字義的依據，同時又是中國字書和文字學書的開山之作，並成爲後世“許學”（或稱“說文學”）和部首制辭書的濫觴。其後《說文》式解析文字形義的字書代有發展。“字典”作爲專書之名出現，據考筆始于唐或唐以前（唐釋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已引用《字典》〈已佚〉一書）。直到清代《康熙字典》問世，成爲我國古代以字典命名的集大成的漢語辭書，影響甚巨，故“字典”^①一詞遂取代“字書”之名而流行不衰。中國史志如《舊唐書·經籍志》、《隋書·經籍志》把有關文字訓詁音韻的書籍統歸于小學類，並不區分什麼叫字典和詞典。自從近代產生了“詞典”（或“辭典”）這個名稱，字典和詞典才開始形成相對分立的界限。

“辭書”一詞則是在近代文獻（如1915年的《〈辭源〉說略》、1936年的《〈辭源〉編輯大綱》）中開始逐漸使用開來的。鑒于該詞在漢語文獻中比在日語文獻中出現得晚，一般認爲“辭書”一詞來自日本。但涵義跟日語文獻中的“辭書”有所不同：

^① 該書名“字典”，乃取其“善兼美具，可以奉爲典常而不易”的意思，參見《康熙字典·序》。

在日文中“辭書”(ジシヨ)就是“辭典”(ジテン),不包括百科全書(日本稱為“事典ジテン”)在內,“辭典”包括語文詞典和專科辭典。而“辭書”一詞,在清末傳入中國以後,通常寫作“辭書”,在漢語中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即辭書就是辭典(指語文辭典和專科辭典)和百科全書的統稱^①。本文所用的“辭書”一詞即採用此義,但在行文中通常專指漢語語文辭書(即漢語字典和詞典)。

當我們用現代辭書學和現代語言學的相關理論,去審視和考察中國漢語語文辭書的整體面貌和發展狀況之時,毫無疑問,不能不注意到我國歷代辭書編纂所形成的優秀的民族傳統。

首先,緊密結合社會的文化需求是我國辭書編寫的一個傳統。縱觀我國漢語辭書發展的歷史,每一種新辭書的出現,總是為了滿足社會文化的新需要,和社會發展、文化需求所提出的現實任務密切相關。如漢朝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當時漢字字體發生巨大變化(由小篆而演變為隸書),給識字教育帶來了混亂,而識緯學家和一些文人任意解說文字^②,違背造字本意。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說文解字》這部劃時代的著作應運而生,及時駁正了當時漢字解說上出現的混亂狀況,滿足了社會的需要。又如秦漢以後,隸書流行,晉朝出現了楷書。和小篆相比,楷書在字體上發生了較大變化,人們在使用文字的過程中不斷創造新字,一個字出現了多種寫法^③。在這種情況下,舊的字

① 《〈辭源〉說略》和《〈辭海〉編輯大綱》將辭書分為普通、專門兩類,以專門辭書包括百科全書,即持此觀點。

② 參見《說文解字·叙》。

③ 參見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

典已不敷使用，社會需要有新的字典出現。對此，顧野王《玉篇·序》云：“但微言久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竟開異義；六書八體，古今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異釋。百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預纘過庭，總會衆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言，文字之訓以備。”可見，《玉篇》的目的，主要在於整理大量異體，總結前代文字音訓，以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他如宋朝出現字典和韻書并行（如大中祥符年間出現《廣韻》和《大廣益會玉篇》、宋仁宗景佑年間《集韻》和《類篇》并行）的局面，遼代和尚行均收集當時北方地區流行的俗字和一些佛典里的專門用字而編成《龍龕手鑑》，金代韓孝彥父子仿照宋朝字典、韻書雙軌制而編成《改并五音類聚四聲篇海》和《改并五音集韻》，明代梅膺祚《字彙》、張自烈《正字通》採用 214 部編排方法撰集而成，清代《康熙字典》“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20 世紀初葉，《中華大字典》糾補《康熙字典》之四大弊病，采西學東漸而輸入中國的大量新詞新語，滿足人們迫切學習新知識的願望，等等，每一種新辭書的產生，無不承繼前代辭書有用的東西，增補新的內容（或增字詞，或改編排方法或體制，或糾補闕謬），密切適應了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社會文化需要。

其次，面向古代，注重歷史淵源，是我國辭書編寫的又一傳統。我國有五千年悠久而文明的歷史，其間四千多年連綿不絕的文獻資料浩如烟海，給中華民族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爲了保存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很有必要對古籍加以研究整理。然而古今語言文字的差異，給閱讀理解古代文獻造成了障礙。首先表現在漢字上，漢字屬於表意文字體系，早在殷商時代既已形成系統

的文字。它形體繁複，字數衆多，加以不斷孳乳、衍生新字，數量日益龐大。其中不少漢字所代表的事物到後來即成為歷史的陳迹，這就要求漢語辭書特別是字典必須面對古代，盡量收錄古字古義，以便人們查閱理解。再者，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用方塊漢字記錄的文言文是古代漢族人民的書面文學語言，它不僅記載了古代先民的歷史、文化，而且還反映了古人運用語言文字的習慣，及字詞含義的遞嬗轉移。如詞義的引申繁衍、文字的假借轉注等等，也都要求漢語字、詞典更多地注重古代。

漢代儒生解經開啓了注重古代典籍的風氣。當時儒家思想被奉為正統，圍繞“經書”的解讀便產生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漢儒的注釋因“去古未遠”而被後人看成具有較大的權威性。另外在語言的研究方面，歷代學者對先秦的語言研究得多一些，兩漢語言研究也積累了一些資料，至于魏晉以下的語言研究就沒有作多少工作，有些時代則幾乎是一片空白。鑒此，歷代辭書的編寫可資利用的語言材料很自然地集中在古代。比如《康熙字典》“悉取舊籍，次第排纂”^①，其收詞釋義的重點仍然放在前代典籍上。雖然序中也提到“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但是就整個字典而言，宋元以下的材料却委實不多。至于《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明確提出“古今兼收，源流並重”的編纂原則，則既注意廣收古代文獻，又注意博采近、現代活的語言，正確處理好古今源流關係。應當說這種做法，正是面向古代、注重歷史這一傳統的進一步發展。

^① 該書名“字典”，乃取其“善兼美具，可以奉為典常而不易”的意思，參見《康熙字典·序》。

第三，不斷吸收語言研究的成果，自覺運用新的語言文字理論來指導編寫實踐，是我國漢語辭書編纂的又一傳統。字、詞典通常總是語言文字研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的歷史產物，沒有語言文字理論指導的辭書編寫是不可想象的。我國古代的語言文字研究通常稱為“小學”，它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三個部分。不論哪一部分的研究取得進展，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對漢語辭書的編寫產生積極的影響。比如，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對漢字結構進行分析的“六書”理論，在東漢時期臻于成熟。許慎充分運用這一理論來分析漢字，並根據漢字的特點創造了部首編排方法，從而編撰了我國第一部詳解語文字典（這在西方到15——16世紀纔有人做這方面的工作）。這就說明，我國字典是在文字學理論的指導下開始編寫的。

又如東漢末年，反切始興，不久，它就被字典編纂者用來為漢字注音（較《說文解字》採用的讀若法、直音法更加進步、周密）。一般認為，魏晉時期的字典如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呂忱的《字林》等都是利用反切來注音的。齊梁之際，沈約、周顒等人，始創四聲之說。這種理論運用到字典編寫上，便產生了按四聲分卷的韻書。如隋陸法言《切韻》等即用平、上、去、入分韻收字。編排韻書的理論也運用到按部首編排的字典上。如遼釋行均《龍龕手鑑》把部首歸并為242部，凡部首字和各部中的字都按平上去入四聲排列順序。宋司馬光、王洙撰《類篇》在部首編排上雖因襲《說文》而小有改動，但是部首內部字的排列却利用了《切韻》系韻書韻目一東、二冬、三鍾、四江的順序，打破了《說文》以類相從的原則。《改并五音類聚四聲篇海》分部首444部，部首排列順序則利用了等韻學上的字母理

論，按照三十六字母順序將部首字歸類排列。

古音學萌芽于宋明時期，明梅膺祚《字彙》除簡化《說文》以來字典部首為 214 部、部首字及各部內字按筆畫多少排序等特點外，還在注音釋義之後附列“叶音”一項（主要收列宋吳棫《韻補》的材料）。所謂叶音是指這個字頭除了《切韻》系韻書的讀音外，在古代它還和哪些字相通押。實際上所指的是上古音。《康熙字典》繼承了這個傳統，把《字彙》的叶音材料都抄了過來。大型漢語辭書《漢語大字典》採取現代、中古、上古（祇標韻部）三段注音，《漢語大詞典》採取現代、古代（包括中古音與近古音，以中古音為主）兩段標音，應當說與上述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訓詁的發展，古書注釋不斷增多，為漢語辭書的編寫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一方面，字詞典從古書注釋里得到營養而極大地豐富自己，另一方面，字、詞典又為古書注釋提供了闡釋依據。清朝嘉慶年間，阮元編寫《經籍纂詁》，廣泛收集唐以前所有經史子集中的故訓，為後世字、詞典編寫提供了豐富材料，本世紀初成書的《中華大字典》在義項的收列上大大超過了前代字典，實際上得力于這部“經典之統宗，訓詁之淵藪”的大書^①。

本世紀以來，中國語言學獲得迅速發展，傳統的小學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得到進一步發揚，從西方語言學吸收來的語音學、詞彙學、語義學、語法學等使漢語辭書的編寫建立在更加科

^① 參見趙振鐸《論我國字典編寫的傳統》，載《詞典研究叢刊》第十輯，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

學的基礎之上。諸如字、詞典的收字收詞原則、漢字字形結構的分析和字體演變的解說、語音的標注、義項的建立與排列、字詞義的詮釋、詞語語法作用的描寫說明、例句的選擇、異體字的整理、通假義項的確立、字和詞的矛盾的解決等等，都有賴于現代語言學理論的指導。

此外，在涉及古代名物、典章、制度時，字、詞典的釋義充分考慮到歷史文化因素，在體例規定的有限範圍內為讀者提供了更多的內容，增加了字、詞典的知識性、實用性、可讀性，這是我國漢語辭書編寫的又一傳統。

20世紀的漢語辭書編纂，一方面植根于古代辭書優良傳統的深厚沃土之中，一方面又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指導，並在長期大量的辭書編纂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逐漸產生了較為系統的漢語辭書學理論，從而標志着中國的漢語辭書編纂走向了成熟。這一時期，漢語語文詞典、專科詞典和百科全書各類工具書得到蓬勃發展并形成系列，辭書編寫隊伍不斷壯大，辭書理論研究廣泛開展，辭書編纂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同時又十分注意借鑒和吸收國外辭書編纂的先進經驗，從而為中國辭書編纂的現代化、科學化、規範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不完全統計，在近百年的辭書發展過程中，我國出版的各類工具書數量高達 14158 (1911—1993 年) 部，占 2000 多年來我國中文工具書總數的 95.8%^①。其中關於語言文字方面的工具書就有兩千多種，成為我國中文工具書“家族”中的重要成員。為此，筆者采用點面結

^① 參見何華連《我國中文工具書編纂出版述略》，載《辭書研究》1994 年第 5 期。